

计量重构历史中潜含的历史虚无主义： 主流计量史学的逻辑缺陷及其批判*

朱富强

[摘要] 计量分析是对一些具有因果逻辑机理的理论进行检验的手段，但如果缺乏广博知识以及相应理论的指导，所谓计量经济分析只能是对资料的计算和统计。相应地，将计量分析用于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其解释力和预测力都存在问题。事实上，对历史的研究首先必须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微观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不能局限于片面性的数据。否则，我们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历史虚无主义误区，最多看到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当前着眼于局部和表象的计量史学研究往往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无法洞悉历史的演化趋势，进而也就难以真正推动认知深化和理论进步。

[关键词] 计量史学 方法论 铁路 工业革命 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7-0071-10

当前，经济史在经济学科中处于边缘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研究传统似乎出现了危机。经济史体现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相应地，经济史的研究者往往是学历史出身，或者是学经济学出身。但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这两者还处于割裂状态。就学历史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无法将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难以通过历史研究将经济理论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很难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就学经济学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受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计量史学的影响，往往倾向于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就局部问题进行量化分析，这导致了因缺乏大局观而无法上升至理论层面，或者因变量的简化而曲解了历史，从而也难以得到传统历史学者的认同。

总体上，当前的经济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考证训诂，一是计量实证。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将经济史研究退化成为一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由此基于局部数据对历史实践进行重新解释，往往缺乏整体性的理论高度。尤其是，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常规范式的影响，计量史学日益盛行，它倾向于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或重构历史，或者用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提供佐证和支持。这种研究失去了以历史反思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的能力，甚至还会导向完全曲解真实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历史研究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认识历史，由此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做深入而周全的描述和再现；二是服务现实，由此需要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促进认知提升和理论进步。本文尝试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计量史学中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解析，审视计量分析在深

* 本文系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与政策体系”(2016WCXT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富强，河南大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化历史认知中的局限；二是考察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对计量分析历史的影响，审视计量史学对经济理论发展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一、计量史学的发展及问题

计量史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受当时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从对短期平衡的研究转移到了对长期经济发展和周期理论的研究。显然，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动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将重点放在历史因素上。这样，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便为经济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从而使得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已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加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康拉德、迈耶、戴维斯·休斯和麦克杜格尔的著作为标志，出现了一种采用与传统经济史学不同研究方法的新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对经济科学的两个杰出贡献是：（1）用量化的方式将历史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2）重新构造或新构造了经济数据库。显然，这两方面使人们可以对早期的结论提出质询并且进行重新认定。新经济史学的特点就在于：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尤其是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现代经济方法（尤其是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透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分析其成败原因，进而提炼出一个对经济变迁进行理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般来说，新经济史学有两大主要分支：一是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分析并重构历史的计量史学，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就属于这一派别；二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重新阐释和认识历史的新史观学，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诺思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两大流派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史研究不仅仅是收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传统史学相比，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呈现两大新特征：（1）在方法论上，新经济史学保持了新古典主义有关稀缺性的假设，运用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使用了假设演绎模式，而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2）在材料上，新经济史学重新构造了经济学数据库，对历史的分析包含了更多的“经济性”原则，从而使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例如，计量史学的创立者福格尔就把新经济史学“侧重于亮度及其对亮度和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认识”抽取出来作为它的基本特征，以数学代替文字形式，从而使之更为精确。

正是计量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史学科跨入了“科学”的行业。赖建诚写道：“经济史（就）不再是抄抄写写，说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而是有命题、有观点、有概念、有分析、有对比、有精确计算的‘科学’分析；因而有了基本的尊严，可以和其他经济学科平起平坐了。”^①同时，正是基于现代方法的引入和数据材料的发掘，新经济史学对一些已被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出了新的解释和评价，乃至提出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结论。如福格尔对奴隶制和铁路的研究、诺思对产业革命和圈地运动性质的重新界定等。于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被快速引入到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的分析之中，人们也大肆为新经济史的新发现而欢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保持一颗冷静的心：计量史学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和严谨吗？或者说，现代方法的研究比传统方法的研究更为合理可信吗？计量分析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关键在于谁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

显然，流行的计量史学大多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下展开的，从而必然先天地带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进而导致相应结论也必然会嵌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之中。^②诺思写道：“计量史学之前的经济史实际上是围绕着制度来建立的，并且，它经由了那些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之手，试图提供给我们一副连贯的制度变迁途径。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演化的故事。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那些缺乏整体结构的零散的理论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的，故而无法形成一般性的结论，或者无法跳出对

^①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② 朱富强：《警惕现代经济分析中嵌入的非历史倾向——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例》，《经济纵横》2018年第4期。

个案的特定特征的分析。计量史学的贡献则在于能将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并且运用复杂而精巧的计量方法来说明并检验历史模型”，“但新古典理论所关注的只是一时试点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这对于那些将解释随时间推移的变迁作为中心任务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①

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泰斗，吴承明先生就根据自身经历指出了计量分析的局限性。究其原因，计量分析所设定的条件往往与历史不符。（1）计量模型的变量有限。譬如，在对灾荒进行计量时往往设定有灾为1而无灾为0。（2）许多条件都只能假定不变。这实际上是将历史现象都看作函数关系，试图用t推出发展，以“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所以，吴承明先生说，自己因是学经济出身而早年偏好用计量分析来研究经济史，但到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改变看法了。事实上，他于1986年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时就已经发现，计量史领域气氛低沉，大量计量史学家已转业；相反，重视整体观和结构主义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始盛行，而这些思维主要来自社会学而非经济学。^②但是，由于福格尔和诺思在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加上贝克尔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带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急速膨胀，计量史学也就迅速排挤了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计量史学的主导地位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明显，似乎只有从事计量分析的经济史学家才能参与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和交流。这种现象果真合理吗？

二、如何理解铁路对工业革命的作用

新经济史学的里程碑式事件是福格尔对19世纪美国铁路的分析，它最终为福格尔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以此为例来审视计量分析史学的内在局限性。

（一）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

传统史学认为，工业革命与交通运输的发展密不可分，如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斯·豪斯赫尔的《近代经济史》等书都强调了交通运输与工业革命间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互为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传统史学还认为，在交通运输革命中，尤其在19世纪的陆路交通发展中，与工业革命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铁路和火车的诞生。一般认为，铁路在工业革命中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1）铁路降低了统一的运费，使得开发大面积的农田在经济方面变得切实可行。（2）修筑铁路引起对制成品的巨大需求，铁路网的建成对工业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例如，鲁道夫·吕贝尔在《工业化史》中就指出：铁路的兴建意味着刺激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效率提高以及产量增加，而这些行业又刺激着其他经济部门。^③（3）铁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一些重要革新的出现和传播。例如，钱德勒认为，铁路建筑的需求导致了美国金融业和建筑业的根本改革。

（二）现代计量史学的误区

福格尔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建立了“反事实”论据：复原了当时主要的工业资料，如运费、主要农业贸易流通量的地区分布、按部门对当时冶金工业交货情况的分析等等；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上又提出“社会节省”概念，由此来估算铁路能够为社会节省多少。由此，福格尔在对这些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铁路对19世纪的社会节省贡献不多，甚至比不上河运，因而传统所认定的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错误的。其理由是：（1）只要把美国当时的水路运输稍加扩大，就能以同样的费用进入95%的农用地；（2）在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方面，在1840—1860年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因而不能用铁路来解释该时期美国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福格尔甚至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因此，

^①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182页。

^② 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鲁道夫·吕贝尔：《工业化史》，龚鸣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实际是微不足道的(对 GNP 的贡献度不超过 2%),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①

有鉴于福格尔分析的细密和穿透力, 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分析结果: 铁路在早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不大。其实, 任何创造发明的贡献都不会在开始时即刻显现出来, 更不要说像铁路这类的新事物, 其价值要得到充分发挥, 往往依赖于其他配套事物的出现, 同时也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 电力发明 40 年后才惠及一般民众, 瓦特改良蒸汽机 80 年后才有普及的商业意义, 飞航器也是 40 年后才有商业和 GNP 上的意义, IBM 制造的大型计算机在 35—40 年后才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等(赖建诚, 2011, 第 52 页)。但问题是, 我们能够简单地以一个事物的构成或比重来衡量它的作用及价值吗? 面对福格尔的“洞见”, 麦克洛斯基就质问道: 照此逻辑, 心脏也是不重要的, 因为它仅仅占人身体重量的 2.5%。更不要说一个事物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能完全被量化, 简单地用数字来衡量往往会失去一些更重要的方面, 犯致命的“破窗谬误”。早在 1752 年, 数学家勒蒂凯梯就提醒他的经济学家朋友: 你们处理经济学就像经院学者处理哲学一样, 当事情做得越来越精细时, 你将不知道在哪里停顿, 何处该停顿。相应地, 今天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数学和计量, 或多或少地是将数学视为一个“中性”工具, 但他们却未曾认真地体悟马克·吐温的一个深邃洞见: 工具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观点。^②

由此可见, 仅就福格尔基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言, 这是非常短视的, 他仅考虑到铁路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 而没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进行更为广泛的审视。譬如, 铁路的主要贡献并不能在直接的经济收益上得以体现, 因为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一场生产和运输的变革, 使得生产地域不再受河流的影响, 使得信息更为畅通, 使得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兴起, 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和 management 方式的变革。显然,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计量分析所能够揭示的。而且, 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并不是短期见成效的,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而铁路投入与其效益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强的时滞。显然, 这也不是简单的计量模型能够揭示的。试问, 当今社会还有谁会否认铁路的作用比运河大呢? 正因如此, 即使计量分析得出了相对客观的“事实”结论, 如何解读它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

三、对工业革命“平反”的再反思

新经济史学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新阐释历史, 同时利用数据的计量分析为这种新历史观提供“事实”证据。一些经济学人, 尤其是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试图重新评估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圈地运动, 甚至致力于为之“平反”, 这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 这里也集中对哈耶克等人的基本论断进行学理性解析, 并审视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新史观所潜含的问题。

(一) 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

长期以来, 史学界一直存在两点传统共识: (1) 圈地运动导致了农民失地和生活水平严重两极分化, 英国的大法官莫尔把圈地运动比喻成“羊吃人”; (2) 大量人涌向城市和工厂, 受到非常残酷的剥削。在很大程度上, 当时工人贫困的生活、糟糕的卫生条件、令人震惊的车间事故以及资本家的贪婪为大量调查报告所证实。例如, 马克思的著作就是建立在 1820—1860 年英国议会报告的基础上,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也是基于当时的事实, 而且这种情形也为大量文学作品所刻画。究其原因, 尽管工业革命导致了经济快速增长, 但无序和强权的制度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贫民窟, 被迫长时间工作却只能拿非常低的工资。

即使在现代社会, 除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学者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家也大多认同对这一历史阶段

^① Fogel R.W.,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4.

^②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杨虎涛、陈国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35 页。

的认知。譬如，鲁杰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中就写道：“恰恰是在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状况却恶化了。雇主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厂雇用妇女和童工以压低工资”^①再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一书中就写道：“幼年儿童在纱厂里轮班地遭受摧毁；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和铁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残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住宅里而沦于堕落；……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见惯的事情。”^②

（二）现代经济学的新看法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也使得英国的人均GDP以及平均工资等得到了显著提高。^③对此，一群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也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计量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考证。例如，经济史学家阿什顿就写道：“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工，而是那些家庭手工作坊工人，他们的传统和市场方法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就业环境最糟糕的，并不是使用了蒸汽机的大工厂，而是在手工场。”^④

正是基于现代经济史学家新近整理的统计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一些受新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就致力于为“羊吃人”圈地运动这一历史论断进行翻案。例如，哈耶克就把传统史学观点称为“一个贬低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的离谱的超级神话”（哈耶克，2003，第6页）。正是以现代计量史学家的分析为依据，哈耶克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间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根本就置之不理，而历史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工资和价格统计数据。”（哈耶克，2003，第2页）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真的就比历史学家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具有连续性的结论更为可信吗？

（三）历史数据分析的局限

哈耶克曾指出，“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抱负是进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影响的纯科学研究。……不过，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哈耶克，2003）

问题是，哈耶克对历史学家的忠告同样适用于当前热衷于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脱离价值观的实证分析。事实上，哈耶克把过去的调查和文字记录视为是一种文学的夸大，但正如S. 韦伯夫妇指出的，“一再发现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黄色报纸的新闻记者，而是部会的视察员和议会的调查员。”（S. 维伯、B. 维伯，2001，第9页）试问：这些视察员和调查员有什么动机来夸大贫困现象呢？而且，即使社会整体确实在发展以及人们的工资确实在缓慢提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应得权利获得了相应增长。事实上，即使社会出现了帕累托改进，但福利增量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公平的，这也会降低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工资基金说”或“最低生活费说”，这显然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经济在快速增长，但人们工资或真实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

同时，即使工人的平均工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其生活水平就会有相应的改善。究其原因，工人们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传统物质生活资料，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购买的生活品，而现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货币了。更不要说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并不主要指物质方面，而是

① 哈耶克：《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 S. 维伯、B. 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8-9页。

③ 王珏：《技术与国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5-177页。

④ 哈耶克：《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22页。

整个生活环境导致了人的福利下降,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对其做了深刻的描述,而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调查都对此做了描述。为此,多德评论说:“(计量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也包括——或仅仅是——把历史观转化成新古典经济学家能用的工具。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揭示’假想的市场魔术的运行方式——只要能够运行,则始终运行良好——而且在此过程中,遮遮掩掩地将显而易见的破坏回报给人类(或一笔抹杀)。”^①

四、计量史学重构历史的潜在问题

上述的分析表明,即使试图借助数据分析来揭示历史的真实状况,也不能简单地选择一些局部数字,而是必须尽可能考察所有相关的内容。例如,在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大众的福利时,不能仅仅看工资指数,还要注意到价格指数、劳动指数、市场化指数以及基尼系数等。同时,在基于历史数据评估某个事物的作用时,不能仅仅依据一些孤立的指标,还必须进一步剖析指数之间的逻辑和因果关系,防止将数据之间的特定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例如,在评估铁路对工业革命的作用时,不能单单依据它在GDP中的比重,而是要分析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再如,在理解工业革命的作用时,不能单看经济增长指标,而是要看它对社会结构、技术变动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

同样,我们在运用计量手段分析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时,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挂钩,不能以经济增长代表社会发展;同时,也不能在劳动生产率与工人的劳动能力或效率之间画上等号,不能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代表工人劳动能力或效率的下降。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在短期内变动不大,而同一批成员在不同组织中所体现出的集体能力往往却相差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生产率所体现的主要是社会成员的团队生产能力。一般地,如果存有一个能激发人们工作热情的社会制度,或者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协调能力,那么,团队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减少,内生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都会降低,相应地,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样,如果生产方式比较合理、劳动工具比较先进,劳动者能够有效地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那么,社会就会迂回地生产,不断提高个人生产效率和团队劳动生产率。因此,只有在社会制度完善、生产组织健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与经济发展一致,社会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制度才是值得赞誉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增长状况,但它无法根本揭示社会福利状况;究其原因,人类的许多福利(如自由、幸福)往往不能用统计数据来体现。阿什顿认为,历史学家所形成的观点是基于专门分析社会不满的蓝皮书。其实,当局通常不会故意夸大社会不满,更不可能地将那些夸大不满的报告在当时就公布于众或者留予后世;相反,那些统计数据更容易伪造,也更不准确。相应地,计量经济学家通过数据处理来剖析历史,貌似提供了更为严谨可信的证据,但实际上却很可能忽视了一些全局性的东西。为此,马歇尔指出,“所有理论家中最为卤莽的和轻率的是那些让事实与数字为他们自己说话的人,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是挑选和组合资料,似乎在告诉我们只要发生在后面的,就是事情的结果。”^②相反,历史记录或社会报告对那些抽象掉了其他社会信息的统计数据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它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为那些统计数据所蒙蔽,而是要从更广、更细的角度来思考历史。

因此,计量经济史学家在纠正传统历史观中可能潜在的问题之同时,更应该谨防自身的系统性错误。

一方面,人类历史的事件是整体性的。历史的整体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某种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是自相统贯的,能够将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但计量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却试图以各个分立的数据为基础,或者热衷于对细枝末节的考据,这种局限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内维尔·

^① 道格拉斯·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页注释。

^② 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凯恩斯就写道：“如果历史学家想恰当地发挥他的作用，他就应该坦然地努力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系，探询事物的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不去应用先前已经形成的一般理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要发现这种关系只有靠完备的科学知识。”（内维尔·凯恩斯，2001，第186页）事实上，当前的计量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无法洞悉历史的演化趋势。究其原因，正如G.弗兰克所说：“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和片断之间的差异。”^①

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需要充分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必须具有历史性视野，要从历史时间来构架理论。但现代计量史学的分析却往往把事件发生的时间视为是可逆的，因此必然缺乏历史性，即使计量史学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研究历史问题，也往往是以过去特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为对象，而不是考察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何宗武写道：“解释历史性要解决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问：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为什么变成如此？富国为什么这么有钱？而不是问：所得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是什么？结构方程式预测经济的表现如何？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经济预测要求利用及时的量化信息对短期未来的猜测。这种量化预测，没有长期经济成长所需的历史性和前瞻性。”^②同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表明，人类对历史的认知也是渐进的，对历史的研究需要以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基础，需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然而，流行的计量史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思维：一是，它往往基于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式，采用一种静态的比较分析方法审视历史现象，尤其是将结论建立在静态的成本—收益分析上；二是，它又热衷于对局部数据的逻辑处理，并基于这种抽象分析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做出新的论断，甚至得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新颖”洞见。更为甚者，现代计量史学往往还将自身得出的结论看作科学的和普遍的，并将由此得出的论断美其名曰“历史革命”，进而展开对历史的解析甚至重构。而且，越是历史知识匮乏的学人，越倾向于采用计量或数理分析方法，越热衷于对历史的重构。现代计量史学宣称它的研究给出了完全客观而清晰的认识，从而实现了历史认识的“终结”。问题是，历史本身就是人们基于不同维度、不同资料乃至不同数据进行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认识具有明显的相对性，需要一代代的学人一直研究下去。吴承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本身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而且，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那些已认识清楚的则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进步又逐渐变得不清楚了，从而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吴承明，2005）。

五、计量史学如何促进经济理论发展

一般地，描述或真实再现只是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更深入地认识历史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从而为现实世界服务则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舒尔茨就写道：“经济史的作用不是重写历史。它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③问题是，我们又如何更好地认识历史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指导。米塞斯就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描述并再现过去的真实，而且，可以说，如果他以尽可能少的偏见和先决条件来看待各种事件及有关这些事件的信息来源，他将会做得最成功”，但“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历史学家不能复制或再现过去；相反，他解释并重写过去，而这要求他要运用一些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已经具有的思想。”^④问题是，我们运用哪种理论来理解历史呢？毕竟任何时代都存在大量相互对立的理论。显然，这就涉及理论的选择

① G.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②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台北：松慧文化，2005年，第431页。

③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④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和取舍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理论的选择和取舍又需要回到历史,需要通过历史材料来加以甄别。究其原因,社会科学理论根本上不是源于纯粹的抽象推理,而更主要来自对人类历史的提炼和抽象。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对现有历史的检验,或者可以从大量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更好的理论,而这又依赖于历史描述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总结来检验理论、发现理论,进而提高或深化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的认知。这就带来了问题:现代计量史学比传统史学更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发现和验证吗?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计量分析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数据的重要性,一个是考证训诂,一个是统计分析。不过,传统史学研究却遭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轻视和否定,被认为缺乏理论性。问题是,现代计量史学的那些分析又具有何种理论性呢?难道它就一定比早先的考证训诂更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吗?要认清这些问题,就关乎对经济理论本质和要求的理解,也关乎对计量分析特性和功能的认识。

经济理论的研究目的根本上体现为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因果关系。显然,无论是事物的本质还是事物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因果关系都不是经验性呈现,而是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加以认知。因此,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应包含四大层次:方法论思维形成、理论形成、理论表达和理论检验。其中,前两大层次是理论研究的主题,后两大层次则是辅助性的。就此而言,当前经济学人趋之若鹜的数理建模主要体现为对既有理论的精炼和表达,而计量实证则是对既有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它们都属于理论研究的辅助性层次,都无法真正提出新知识,进而也就无法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的实质进步。^①例如,基于归纳的计量分析往往只是得出一些具有严格适用条件的趋势,而无法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同时,受各种计量工具和数据资料所限,有限的计量分析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证实或证伪一个基本理论。计量分析的内在缺陷不仅体现在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和检验中,也体现在对历史数据的处理和认知中,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计量史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尽管计量分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和处理分析,但其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却是值得怀疑的。究其原因,其在相关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根本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相关数据等资料,也根本找不全这些资料;相反,往往为了论证某些观点而寻找一些相关的数据,即使存在一些明显相互冲突的数据也会置那些不利证据于不顾,更鲜有人会对其所引用的数据的真伪性作一番考证。而且,即使目前普遍使用计量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这使得数据之间的关系更为精确,研究的结论也更具因果性,但其中的缺陷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1)在计量模型设立时,变量的选择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特别是基于计量建模的简约性原则,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无法量化的变量往往被无情地舍去了;(2)在分析主观设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数据的选择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一些数据值的偏差将会完全改变计量结果;(3)即使基于计量分析得出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一些数字关系,但还是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逻辑,因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设定本身就具有主观性。^②

更重要的是,纯粹的计量分析往往是描述性的而非理论性的研究,把它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如内维尔·凯恩斯指出的,“理论知识,即过去所建立的与经济现象有关的一般性命题,会告诉历史学家什么样的事实可能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甚至在我们只是历史事件的搜集与整理时,理论的帮助也使很大的……(因为)经济现象极度复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现象需要研究,某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完全有可能被我们忽视”,而且,“仅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受到叙述者本人的理论观点的影

^① 朱富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四个基本层次及其内在关系——反思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向》,《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② 朱富强:《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吗?——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1期。

响。他很容易重新组合他的事实材料——使得这些材料反映出他自己取向得到的那些结论。”（内维尔·凯恩斯，2001，第185页）事实上，如果没有广泛的知识并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所谓经济史研究就只能是对文献资料的整理；相应地，研究者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史学家，而只能是资料管理员。就此而言，所谓计量经济研究也只能是资料的计算和统计，计量经济学家也只能是资料统计学家，进而也就根本无法从其工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经济史学与计量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同一研究路径，两者都注重材料甚于思想，只不过计量经济学对材料的处理手段更丰富、更精微（当然也可能更偏离实际）。这也意味着，尽管传统经济学积极吸收现代的计量分析工具之后就出现了一门新的科学——计量史学，但这种研究路径本身并没有脱离原来的经济史学的特征。因此，尽管计量史学往往被称为一场经济史学的革命，但连福格尔那样杰出的新经济史学家也承认，“在旧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连续性的线索。”^①也就是说，当前流行的计量史学具有与局限于考据的传统史学相类似的局限，都可能因仅仅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大局观、历史观和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计量史学之所以贬低传统经济史学，根本上就在于它接受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把形式逻辑的严密性视为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萨蒙就写道：“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了通常的证实分析……他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发展的过程受到……非证据思考的极大影响。”^②

而且，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历史提供的经验材料要比数据计算提供的重要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对经济史的梳理和提炼。余英时就曾指出，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事件时往往会兼顾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角度，其中，外在性关注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而内在性则要解释事物的内在机理。^③相反，承袭了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局限于事物的外在性，试图寻找事物之间的一般关系从而将其纳入一个抽象法则之中；相应地，现代计量史学倾向于基于数据处理来分析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从而确立某种相关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学家往往比数理经济学家对历史发展进程和状况具有更为渊博的知识，他们剖视历史的角度更宏远，传统史学也比计量史学更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机理。

事实上，为了给经济理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经验材料，经济史研究必须契合广博的历史和理论知识，而不能仅仅基于孤立环境下的数据处理。例如，内维尔·凯恩斯就指出，“经济史使人们懂得了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的限制条件。它要求我们注意经济环境特点的变化，它说明，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解经济现象的那些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内维尔·凯恩斯，2001，第182页）同样，余英时也强调，“若我们纯粹从统计数字与分门别类的眼光来探求人类的经济生活，则所得者只能是一些干枯而无生命的结论；这决不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真正目的。既然如此，经济史学家便应该放开眼界从整个文化背景着眼以求真正能了解历史。”（余英时，2004，第25页）但不幸的是，现代计量史学却不是通过历史史实来发现和修正理论的，而是热衷于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那脱离具体历史的“一般”理论甚至是依据那种与理论毫无关系的“死”数据来“修改”历史。索洛就遗憾地说：“经济理论没有从经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并且仅仅历史受到经济理论滋养的同时，也受到经济理论同样的腐化。”^④正是由于遵循的经济理论来自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展开的历史重构也必然带有深深的历史虚无主义特征。

由于囿于一些局部数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普遍存在G.弗兰克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试问，那些执着于摆弄数学模型的人，有几个能够对经济现象发生的机理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②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42页。

③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页。

④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计量史学对经济史的研究，从而严重误导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看一段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话语：“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自然科学范例的帮助，而在别的方面又受到了妨碍”，统计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进行统计学上的概括对于他并没有好处，除非他能由此而探测他所进行概括的那些事实背后的思想。”^①

由此可见，不仅基于计量分析来重构历史往往潜含着严重的破窗谬误，而且试图通过计量史学来完善和重建经济理论也会遭遇严峻的逻辑困境。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甚至认为，经济理论不仅无需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而且也无法被历史检验。其理由为，一个事实要成为可用于检验理论的事实，就必须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要与其他可获得和可重复的事实同质；但是，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变动不居的众多原因的一个合成结果，这些原因之间也无一保持不变的关系，因而每个历史事件就是不同质的，历史事件也就不能用于检验或建立历史规律、数量规律或其他形式的规律。^②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人类偏好、意志、知识以及价值观等都在不断变化，社会环境也在不断演进，因而计量经济学根本无法在人类历史中找出一个不变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通过历史来推动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呢？根本上，这需要运用契合分析和回溯分析等方法，而不能局限于计量方法。

六、结语

由于计量分析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主观性，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有待结合其他知识进行审视。事实上，欧美很多史学家对计量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往往持怀疑态度，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计量史学曾盛行一时，但 80 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就已经逐渐冷淡了。然而，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研究范式逐渐拓展到了其他学科，乃至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新方法。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史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材料，然后再利用计量工具加以处理，这就是计量分析史学。尤其是受福格尔和诺思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激励，计量分析史学得以迅速崛起，基于历史数据的细枝末节进行分析的论文得到推崇，而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则往往因缺乏原始数据而遭到贬抑。结果，传统史学方法逐渐被否定和抛弃，这在追求“名牌”意识的中国经济学界尤为显著。然而，本文的分析却表明，计量分析史学无论是在对历史认知的深化方面还是在理论构建的推动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相反，契合多方面知识的传统史学对历史的理解反而更全面。事实上，吴承明先生就指出，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而用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却把社会给丢了；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勃兴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史料考证，将史料视为不可靠，认为只有用逻辑推理得出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吴承明，2005）。由此，面对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计量史学中极度推崇基于数据的逻辑分析这一流行取向，我们需要持审慎的态度，认真剖析其中潜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和把握未来。

责任编辑：张超

^①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319-320 页。

^② 罗斯巴德：《人类行为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